

鲁迅书简追忆

黄源

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书简追忆

黄 源

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书简追忆

黄 源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字数 48,000

1980年1月第 一 版

198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200

统一书号：10103·123

定 价： 0.26 元

鲁迅先生给我的信，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三十八封（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夜写的第一封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夜写的最后一封）。这些信最初全部编入许广平先生编辑的《鲁迅书简》里，现在也已编入《鲁迅书信集》。

这些信，鲁迅先生写于战斗的最后三年间，谈的都是文学工作上的事，如对于《译文》稿件的处理，寄稿《文学》月刊，《译文丛书》的筹划，翻译《果戈理选集》的打算，《译文》的停刊和复刊，对付敌人的谣言攻势，等等，这些好象都是属于编辑事务性质的。事实上，鲁迅先生在指示怎样处理这些编辑事务时，首先考虑的是我们面对着的敌情和内部的关系，因此这些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中对付检查制度的战斗指示，具体体现着无产阶级的战略与战术思想。从鲁迅先生晚年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学习他在反“围剿”斗争中怎样对付敌人的战略，怎样处理阵营内部的人与事的关系。学习这些具体的战斗经验，有利于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从战斗的实际出发处理问题。虽然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其中有些事好象彼此无关，实际上是有联系的，并且是发展变化的，如其不在斗争中，较难知道底细。这些，我试图根据我当时知道的，后来体会到的及现有的材料，作些说明。

河清先生：

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

迅 上 八月十四夜

（《鲁迅书信集》731封·1934年）

对鲁迅先生给我的这第一封信，我着重谈谈他是怎样对付敌人一九三四年在文化“围剿”中采取反动的图书杂志“检查”的新战略的。

先从信里的具体事情说起。鲁迅先生在《译文》创刊号上用许遐笔名，译了俄国果戈理的一篇很有名的短篇小说《鼻子》，又译了日本立野信之作的短论《果戈理私观》，作为配搭。鲁迅先生写的关于这篇短论的《后记》，文章不长，指出作者的政治动态，文章的长处和可取之处，周到而精辟。

这短论后面的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原来都用的鲁迅的名字，来信指示都改为邓当世。（《译文》为尊重原作者，本文题目下只署原作者姓名，译者的署名都放在文章的后

面。)

这信里的“检查诸公”，是指国民党“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会”设在上海的“书报检查处”。这机关正式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何月何日，说法不一，暂且不谈。总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的图书杂志都早已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就被审查过了。我当时是《文学》月刊的编辑，对稿件被审查的事情，至收到此信时已有半年以上的经验，这点鲁迅先生是知道的。但这信里仍然指出：一、不要相信敌人的鬼话，什么审查标准“一秉大公，无丝毫偏袒”之类全是鬼话，不要上当。二、要迷惑敌人，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使知道《译文》社有鲁迅先生在内，虽然这个秘密不可能长久保住的。三、对敌要小心。

鲁迅创办《译文》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天左右，《申报》副刊《自由谈》由张梓生接办，黎烈文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台。对此，鲁迅先生是很不甘心的，要黎烈文继续战斗下去。在他被迫下台不到一个月，在六月六日，鲁迅先生就写信给黎烈文，约他九日晚“惠临敝寓，除谈天外，且吃简单之便饭。”九日《日记》上也记着这件事。这夜晚的谈天，即谈创办《译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邀请黎烈文为《译文》创办人。在《译文》创刊号《前记》里，因对付检查官，只是轻描淡写地写成偶然碰在一起，谈得高兴，就产生了这本小小的《译文》。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创办《译文》，首先是为了建立一个新阵地，打击敌人和攻击旧思想。其次是翻译些外

国作家的作品，同时翻制些外国的绘画，特别是木刻，作为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借鉴。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鲁迅书信集》898页）其三是纠正对翻译的不正之风，培养和组织翻译的队伍。最后，在战斗中讲道义，在策略上讲统一战线，支持被迫害的同人，让他继续发挥作用。

鲁迅先生着手编《译文》时的情况，《鲁迅日记》里记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晴，热。自晨至晚编《译文》。……肋痛颇烈。”热得怎样？鲁迅先生在八月七日致增田涉的信中，很有风趣地说：“上海又是九十度以上，鄙人正以满身痱子，作为光荣的反抗旗帜而奋斗着。”又说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凡是不愿当私人的走狗，有自己兴趣的人，较为关心一般文化的人，不论左右都看作反动，而受迫害。……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这是在编《译文》两天前的情况。当时“肋痛颇烈”，我看到《日记》后才知道。

鲁迅先生就是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大热天里编译好《译文》的。接着，大约在八月十一、二日，他请茅盾先生约我，在茅盾先生家里会面。茅盾先生住在大陆新村六号，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和鲁迅先生住在同一个大陆新村。那次会面，我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写的《鲁迅先生与〈译文〉》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鲁迅先生从前门进来，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短短

的，腋下夹着一个用日本包袱包的书包。”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很热，外面太阳猛烈的晒着，鲁迅先生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里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一张方桌靠墙放着，我和先生对面坐，茅盾先生坐在中间，朝着墙壁。”我们“谈了一些时候，先生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译文》创刊号的稿子，以及制插图用的各种画册木刻。先生把稿子和画册等都交给了我，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名用几号字体，插图缩成多少大小，都已一一注明，总之差不多自前记以至后记，一切都编制定当。”（《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第372页）

这次会晤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如在眼前。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并没有谈到检查、化名之类的问题，因为鲁迅先生在《自由谈》发表的文章，全用化名，已习以为常了。《译文》创刊号九篇译稿，茅盾三篇，一篇用本名，两篇用芬君、味茗两笔名，黎烈文两篇，都用本名，瞿秋白一篇存稿，用笔名，鲁迅三篇，两篇用许遐、茹纯两笔名，只有立野信之作的《果戈理私观》的译稿，署鲁迅名。鲁迅先生这样安排了，茅盾先生没有意见，我就准备按照鲁迅先生编定的去付排。稿子交我后，鲁迅先生大概想想自己还是不出面的好，十四日夜里马上写了这封信。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敌人虽是最高的轻蔑，在战略上把蒋介石之类只如实地看做一伙流氓加几枝手枪而已，但在战术上却决不轻敌。初战尤其郑重。鲁迅先生自己编的三期，他总共译了十篇，鲁迅先生的名字，一次未露

面。直到第四期，他才用鲁迅署名译了契诃夫的《奇闻二则》，这是几篇轻松的短篇小说。

当时我只是遵照指示办了，也知道这是对付敌人，但头脑里还没有战略和战术的观念。现在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看，鲁迅先生曾经把文化“围剿”中的检查问题，是当作敌人的新的战略来认真对待的。

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主将鲁迅先生，对小丑的新把戏，了如指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敌人的战略转变刚冒头，就被他抓到识破了。鲁迅先生对这反动的检查政策的新战略产生的具体过程和施行的情况，每一步骤都注意着，掌握情况，决定对策。真正做到他自己一贯主张的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

当第五次军事“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浙江国民党省党部一批党棍的反革命的嗅觉好象特别灵，首先在文化“围剿”上对杭州的书店开刀。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卅一日夜致曹靖华的信中，立刻反映了这文化“围剿”的动向：

“日内又要查禁左倾书籍，杭州的开明分店被封了，沪书店吓得象小鬼一样，纷纷匿书。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不过我有准备”。这里谈的还是老一套的查禁。隔三天，十一月三日夜，致郑振铎的信中，又谈到此事，但比较具体了：“对于文字的新压迫将开始，闻杭州禁十人作品，连冰心在内，奇极，……茅兄是会在压迫中的，而且连《国木田独步集》也指为反动书籍，你想怪不怪。”接着提出

一个特殊的新情况，“前日（源按：该是十一月一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召书店老板训话，内容未详，大约又是禁左倾书，宣扬民族文学之类”。潘、朱是上海文化特务的头目，反动的民族文学运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所以鲁迅先生在会议内容未详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估计。到十一月五日，鲁迅先生就已进一步掌握了会议的内幕：这黑会“讨论”“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象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同日在致姚克的信中也指出：“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版物之情形可以推见。”（《鲁迅书信集》431页）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献检查之秘计”（《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先生也说过这不是在他做“《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准风月谈》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到十一月七日，这献计是在十一月一日，其实是在那时期内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献堡垒之秘计的是柳维垣、戴岳（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献检查之秘计的，鲁迅先生也听到传闻的。虽则他也说，“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鲁迅先生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回上海，到一九三〇年发起和参加左联后，他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

列。”（《鲁迅书信集》1152页）但他的文章发表前须经官方检查，却只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在《申报·自由谈》投稿才开始。当时只有报馆里有“官方检查员”。（《伪自由书·前记》）一般图书杂志是未经检查就出版的。单从文字上说，从查禁到检查，确是一个新的反动措施，也正是文化“围剿”上的新战略。根据敌人的这新情况，鲁迅先生在十一月八日就构成了这个战略性的判断：“看近日情形，对于新文艺，不久当有一种有组织的压迫和摧残，这事情是好象连几个书店也秘密与谋的。其方法大概（这是我的推测）是对于有几个人，加以严重的压迫，而对于有一部分人，则宽一点，但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删去其紧要处而仍卖其书”。（《鲁迅书信集》435页）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这“会有检查制度出现”。从一九三四年检查政策施行到一九三五年六月间的因为“新生事件”而火灭烟消为止，历时一年半，鲁迅先生是把它作为文化“围剿”中的一个新阶段来对付的。鲁迅先生的英明处，还在于他看透并抓住这特点，决不为在斗争发展过程中敌人仍兼用老一套文武讨征的伎俩所迷惑。例如离前信不到一星期，敌人就来一次全武行。十一月十二日艺华影片公司被捣毁，次日良友图书公司被毁一玻璃，十四日捣毁《中国论坛》，卅日袭击《神州国光社》。各书局报馆皆得警告。鲁迅先生说：“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准风月谈·后记》）果然，京沪四报，对他合伙来讨伐。鲁迅先生特

地选了六篇征伐的大文，刊在他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使我们至今还有机会欣赏这些征伐的黑文。

毛泽东同志说：“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鲁迅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受着文武讨伐的时候，早已在考虑到敌人下一步的反动的战略性的措施。一九三三年底，他在敌人讨征声中，已作出明确的判断：“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准风月谈·后记》）从十一月三日信中反映出他获得敌人十一月一日召开了黑会，五日已获得确切的情况，八日作出初步的判断，到年底下此结论。这个“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的作文，犹如毛泽东同志的用兵，是针对敌情，知己知彼，因此是战无不胜的。但鲁迅先生的侦察手段，我想：一，是报纸，上海小报特别多；二，是熟人口头的谈论；三，是友人书信报道。从这些材料里作出判断。历史事实证明，鲁迅先生建立在不断的调查研究上的判断，是颠扑不破的。

果然，一九三四年新年新事，敌人的文化“围剿”，以检查制度的新战略前进了，向上海各个文化阵地猛扑过来。一九三四年一月实行的检查，实际上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就实施了。《文学》的新年号（二卷一号），隔年被检查，被砍杀得

不成样子。巴金的长篇小说《雪》，被抽去（巴金后来自己出版），短篇小说被抽去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和夏征农的《恐慌》。有一个征文特辑叫《文坛何处去》，有张天翼、台静农、欧阳山、郑伯奇等八人文章，当然不会有主张文坛往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的，全部被抽光。唯一保留住的一篇《清华周刊文学创作》的评论，是因为茅盾用“惕若”这笔名尚未被发觉。其余左翼作家的作品全部被抽光。巴金的名字竟不准见世面，《新年试笔》征文中有一篇巴金的，勒令署名改为“比金”。以后巴金有一个时期在《文学》上发表小说，只得改用王文慧的笔名。这只要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文学》上登的要目预告，跟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的目录，对照一下，就可证实。预告之外的文章也有被抽去的，不在例举之列。

《文学》被检查得脱期了，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夜给郑振铎的信里说：“《文学》二卷一号，上海也尚未见，听说又不准停刊，大约那办法是在利用旧招牌，而换其内容，所以第一着是检查，抽换。不过这办法，读者之被欺骗是不久的，刊物当然要慢慢的死下去。”（《鲁迅书信集》477—478页）

这是鲁迅先生通过郑振铎对《文学》的关心和警告。被敌人“抽换”是死路。郑振铎是《文学》的创办人和主持者之一，他当时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书，在北京又和章靳以合编《文学季刊》，鲁迅先生在同信中又及时地指示，“北边的容易犯讳，大概也不下于上海”，“我的意思，以为季刊比月刊

较厚重，可以只登研究的文章，以及评论，随笔，书报介绍，而诗歌小说则从略，此即清朝考据家所走之路也。如此，则成绩可以容易地发表一部分。”这意见完全符合于我们党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执行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政策。（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一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给萧三的信中，对上海几种文艺杂志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的情况更做了全面的估计和精辟的分析，说：“《文艺》本系我们的青年所办，一月间已被迫停刊；《现代》虽自称中立，各派兼收，其实是有利于他们的刊物；《文学》编辑者，原有茅盾在内，但今年亦被排斥，法西斯蒂将潜入指挥。本来停刊就完了，而他们又不许书店停刊，其意是在利用出名之招牌，而暗中换以他们的作品。至于我们的作家，则到处被封锁，有些几于无以为生。”就在这个因抽掉了很多文章而脱期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号的《文学》上，刊有二则启事，一则申明自本期起，改由傅东华、郑振铎主编。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颁布的“恶出版法”中新规定，凡杂志编辑，不得用社团名义（按：《文学》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的编辑者用的“文学社”名义），必须由个人负责，是用以限制左翼人士的。现由傅、郑出面。其实《文学》编辑部仍旧依靠茅盾先生出主意，供给稿件。从社论到书评，从论文到小说，哪个主要部门缺重要文章，茅盾先生一手任担。《文学》的政治倾向主要根据茅盾先生的指示，至少我在实际工作中是这样体会的。

对左翼作家开门，团结进步作家对法西斯蒂关门。鲁迅先生担心《文学》被迫走上“潜入指挥”与“暗换作品”的死路，这一关是紧紧地把守住的。（当然政治上的敌我，明的容易辨别，把守路线关，却要点水准了。）第二则启事申明“近以种种原因，致出延期”，算是透露一点被压迫以致脱期的消息。

敌人当然知道《文学》不仅不属于它，而且不靠向它，因此它对《文学》特别凶。二月号被抽的文章更多。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给姚克的信中说：“检查已开始，《文学》第二期先呈稿十篇，被抽去其半，则结果之必将奄奄无生气可知”。

《文学》编委会为了对付检查压迫，从三月份起到六月份，连出四期专号，其中二期是翻译的，一期是中国文学研究，只有一期创作专号，以抵制敌人的抽换。

到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检查制度的袭击式的摧残压迫，已变为经常性了。鲁迅和茅盾先生在六月决定创办《译文》，接洽定当，八月集稿，准备九月十六日创刊和读者见面。在出版和读者见面前，首先要通过检查关，这是必须小心对付的。鲁迅先生亲自主持的《译文》面对检查的斗争，还刚开始哩。

以上的情况说明，从一九三四年开始，上海的文化界就面临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检查制度的折磨。这种书报检查的折磨，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也受过。他说：“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七卷437页）

鲁迅先生是长期斗争过来的，敌人的新花招还在幕后策划，就被识破了。他把他的观察判断、对敌的策略忠告各方面，并以自己的战斗的文章和译稿加以援助和支持。他自己更是斗争在第一线，谈风月就谈风月，“带着枷锁的跳舞”，还是跳舞。在一九三四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之下，编成集子有二本：《花边文学》与《且介亭杂文》。这些集子的编法和先前也不同了，将被检查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而且亲加黑点，以清眉目，全篇被禁止的完全补上。这样把检查制度下明诛暗杀的政策赤裸裸地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集子当然是“非法”出版的，但一出版就脱销，敌人再加禁止，也早已流传于广大的读者之间了。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年底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宣告：“我拟从明年起和检查官们一战”。（《鲁迅书信集》1202页）他是把这作为战略性的仗来打的。

茅盾先生说得好：“当然首先要学习并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我们的学习鲁迅才不是皮毛。”（《向鲁迅学习》《世界文学》1977年第一期）这话非常正确深刻。我们只有真正读懂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才能懂得鲁迅先生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战略与战术。根据毛泽东同志把军事上第五次“围剿”中的堡垒主义看做是一种新战略，我们才领会鲁迅先生认真对待文化“围剿”中的检查政策，实际上同样把它看做新战略。毛泽东同志说：“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

意。”（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根据毛泽东同志这英明指示，再看看鲁迅先生上面这封信，战术观点就很明确了。四十年前我还不懂得这信的分量。鲁迅先生的信，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事实证明，鲁迅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战略与战术思想也是和毛泽东同志相通的。

二

河清先生：

添进 Becher 的诗去，极好，他是德国最有名的普罗诗人，倘不逃走，一定要坐牢的。译诗想无后记，M 先生说可以代写一点，迟若干日交卷。

我有他的一张铜刻的画像，但颇大，又系原板，须装镜框才可付制板所。放在内山书店，令人持生活书店片子或先生的片子来取，怎样？

黎先生来信谓孟斯根常投稿于《论语》，《译文》可否用一新名，也有见地的。但此事颇难与本人说。今日已托一个他的朋友与之商量，所以他的那一篇，送检查可略迟一点，以俟回信。但若名字改动，虽检后亦无关，那就送去也可以了。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廿五夜

（《鲁迅书信集》773封·1934年）